

# 小说 艺术 面面观

格 非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 7-5333-311-1

06



格 非著

# 小说 艺术 面面观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番新潮作家

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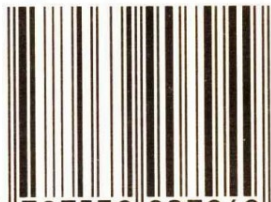
一回后生精锐

对传统小说技法的悖离

一种新的视境

造成一种新的话语

ISBN 7-5399-0794-0



9 787539 907949 >

# 小说 艺术 面面观

格非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 新登字 007 号

## 小说艺术面面观

---

作 者：格 非

责任编辑：朱建华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泰州人民印刷厂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160,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

印数：1—1,500 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94-0/I·758

定 价：7.5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小说与现实 ..... | 1   |
| 第二章 | 作者与读者 ..... | 25  |
| 第三章 | 故 事 .....   | 56  |
| 第四章 | 结 构 .....   | 109 |
| 第五章 | 语 言 .....   | 134 |
| 第六章 | 小说的未来 ..... | 175 |
| 后 记 | .....       | 194 |

##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 —

崛起于九十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使得批评界期待已久的某种文本如期而至：小说终于从前些年实验小说痛苦的徘徊之中走了出来，它不再走政治图解，不再是语言游戏和精神幻想的游历，它回到了伟大而平庸的尘世，它以表现琐屑的日常生活为己任，它亲切可感，沾染了生活的露珠和芬芳，从而消解了实验小说与读者之间一度形成的紧张关系，写作与读解、消费达成了惊人的和谐。很多批评家为它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自有他们的理由，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温文尔雅的时代到来。

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中，只有少数的学者

保持沉默，他们持有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足以表明他们对历史记忆犹新。

回顾以往，文学中对于“现实主义”的呼唤由来已久。当我们刚刚开始接触文学之时，我们意识的每一处缝隙即被一系列和现实主义相关的词语的网络所覆盖：反映论，典型论，镜子说，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修辞和技法，更不用说我们古老民族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了。

在此，我们无意对现实主义传统作出全面的回顾与评价，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被高度抽象化的“现实”这一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与作家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对我说，他在阅读“文革”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感觉上更像是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他的那番话也许表明他对中国文学缺乏根本的了解，或者说，它昭示了东西方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形成的审美差异，但是，它却至少引发了我这一连串的思索。

众所周知，西方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离出来的，而中国小说，我指的主要是唐宋以来的白话小说，则和话本、弹词、鼓词等说唱艺

术关系密切。中西方的小说在早期各自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相似的诸多现象。比如传奇故事的大量叙述,戏剧化的艺术处理,小说作者在诗歌艺术辉煌的殿堂门外显得很不自信等等,但在另一方面,就中国小说而言,它由于受到诗歌和绘画中写意传统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置于首要地位,或者说,现实主义在一开始就显得营养不良。首先,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来说,秦汉以前的神话小说,唐代的志怪传奇以及明清时期的文人小说所涉及的生活层面极为狭窄,述异志怪,文人雅趣通常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其次,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正如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伟大的现实主义篇章,只要我们粗粗浏览一下唐宋传奇、明清的笔记小说,我们便可发现,从道德说教的愿望出发敷衍故事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只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同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对历史的直



接记述。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理查逊,菲尔丁,司哥特到巴尔扎克,欧洲小说一直遵循着一条再现现实的传统,每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历史变迁以及相应的风物人情,自然景观无一不记述在案。假如欧洲的所有历史著作某一天全部散佚,历史演变的每一进程依然可以从小说中清晰可见,尽管小说家的记述方式,思考的角度,关注的焦点与哲学家、历史学家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巴尔扎克作为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欧洲作家之一,他将现实主义小说推上了顶峰,同时也导致了这一古老的伟大传统的衰落。但这种衰落仅仅是一种蜕变。在巴尔扎克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再现现实的传统向前延伸的轨迹。即便是法国名噪一时的新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到这一传统的巨大回声,所不同的是:新小说的作家们完全从可视可听的外部世界的临摹中摆脱了出来,通过感觉本身对现实的种种深藏不露的性质重新加以建构,更为有效而准确地揭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试图重新考察小说与

现实的种种关系时，我们不应忘记“现实”这一概念在十年浩劫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它极为丰富的内涵被一再简化，抽象化，进而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作家不再听命于自身独特的情感、想象、创造力的指引，而是像一个乡村记录员似的，将从新闻里听到的气象报告准确地抄录在村头的布告栏上。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不是神圣的发现与创造，而是一种政治意图的阐释者和重述者。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文艺思潮在文坛上走马灯似地纷纷亮相，作家对现实重新思考促使文学开始了急剧的蜕变。在这条持续不断的蜕变之路的尽头，新写实小说形成了空前的繁荣。按照某些批评家的看法，新写实小说经过了几年前的文学实验和语言操练之后，已经在修辞和技巧上完成了必要的准备，一俟条件成熟，当代小说之树结出累累硕果已是指日可待了。

就新写实小说这一流派本身来看，作家的创作确实体现了把握现实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小说（譬如刘震云的部分作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类小说由于过分沉醉于琐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从而丧失了个人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沉思。他们所描绘的烦恼

虽然带有某种普遍性,但只是早已为大众所习知的概念化的烦恼。这是一种沿袭和借用,而非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更谈不上灵魂对于存在终极价值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一旦放弃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放弃了自身行为方式的自信与执著,不仅对于现实的深切把握无从谈起,就连想象力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有力的扼制。

也许作家们的创作与批评者的解读从根本上说完全是两回事。在阐述小说与现实的种种关系时,很多学者依然将修辞与形式、形式与内容、内容与作家的存在方式完全割裂开来,似乎变化中的形式对于一成不变的内容完全是可有可无。这就形成了形式与形式主义,现实和事实,借鉴与抄袭的等同与混淆。

那么,“现实”这一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或者说,作家与他体验、感受到的现实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当经济危机席卷美国之时,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将有某种危险。他取出这笔存款的第二天,已经倒闭的银行

门前排起了长队。为此阿瑟·米勒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他用那笔存款买了一辆跑车,置身于事外的喜悦使他颇为受用。可是,第二天,那辆跑车却不翼而飞。这使米勒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终于发现,当灾难袭来的时候,人群中的每一个个体无人能够幸免。

后来,当阿瑟·米勒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现实是一条持续流动的河道,它不仅和过去紧紧相连,同时也与未来密切相关。现实属性的变化必然要求小说作出相应变化。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现实”的易变性对于作家的敏感性以及智慧同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现实”真实的把握有时是一种能力。它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他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正如罗兰·巴特曾指出的那样,没有智慧,真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有时,我们自以为感受到了现实的真实,其实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阴影而已。

## 二

当福楼拜将刚刚写出的《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章朗读给朋友们听时，立即遭到了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在朋友们看来，福楼拜在第一章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一顶帽子使人无法容忍。这顶帽子不仅超出了上下文意义的需要，而且破坏了作品的“圆满”。在这里，福楼拜第一次使小说的叙述出现了某种缝隙，它看上去显得毫无意义。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人们重新评价福楼拜的小说成就时，各种褒扬和荣誉接踵而至，其中，很多批评家和文体家将福楼拜推为法国现代小说的鼻祖，而《包法利夫人》第一章中对于帽子的描述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细节，被批评者竞相加以引用与阐释。

在现在看来，这一细节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在一八五七年前后，现实世界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再也不是一个充满戏剧性事件的圆满的线性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中，世界似乎于每一秒钟都在上演着一出因果相承、悲欢离合的戏剧），而是布满了



偶然性的松散事实的总和。那顶帽子也不再是构成小说情节的重要道具——就像屠格涅夫曾经评述过的那杆著名的猎枪一样，而仅仅是现实的一个片断。福楼拜对待现实的态度极好地适应了现实生活的变化——随着非戏剧性的事件引入小说，叙事学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揭开了序幕。

戴维·里斯曼在其《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当代现实的种种特征作出了精微的分析。按照他的见解，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总体特征各不相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个体遭遇的痛苦及其救赎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在巴尔扎克的年代，崇尚个人化的行为方式成了时尚，过去时代拜伦式的英雄在这个时代比比皆是。实际上，巴尔扎克正是这样一位英雄。即便是现在来看，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是他却是以一个企业家的心态从事小说创作的。譬如他具有顽强的决心，坚定的意志，规定每天写三十页书，每年出版一部著作，用近一百部作品反映社会的各个不同的侧面，从而完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等等，巴尔

扎克这样做，完全存在着他个人的理由。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之中，新教伦理引导之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个人的欲望、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戴维·里斯曼认为，二次大战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当代社会的性质发生了进一步的激变。这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它日渐趋于组织化，整一化。社会中的个体，作为“有组织的人”成了庞大社会运转机器中的一个“物件”。个性不再显得重要，个人主义丧失了意义。个人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下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

很显然，戴维·里斯曼当代西方社会的分析的思路和马克思利用“商品”对资本主义进行解剖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经济基础决定论是他们立论的共同背景。这一看法与当代西方作家敏感的意识所触及到的现实结构具有某种一致性（在小说上，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兰茨·卡夫卡）。

六十年代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有纳塔丽·萨罗特和罗伯-格里耶参加的圆桌会议上，罗伯-格里耶曾经指出：“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于十九世纪小说家的形式写作，并不是我们

凭空想出了这一形式，首先是因为我们要描写和表现的人的现实和十九世纪作家面临的现实迥然不同”<sup>①</sup>。纳塔丽·萨罗特进一步提出：长期以来存在于大部分作家意识中的心理习惯，思维惰性，旧的和表现手法极大地妨碍了捕捉新的现实，而在我们周围出现的新的现实，即使许多人意识不到，实际上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新小说的代表作《嫉妒》中，作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描述了嫉妒者，他的妻子及其情人与他们周围事物的关系。嫉妒者通过一扇百叶窗（在法文中，百叶窗与嫉妒者同一个词）窥视妻子及其情人的一举一动。尽管嫉妒者从头至尾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但读者可以通过“第三把椅子的空缺”隐约感到他的在场。在这里，嫉妒者情感，个人特征的印记，是通过物——椅子，咖啡杯等来体现的，或者说，人与物的紧张已经消失。小说中的三个人物都被作者加以不同程度的物化，物作为唯一的具体现实，取代了人的位置，除了物的存在之外，“人的现实和情感不可能具有任何自主的现实意义”。

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曾试图将新小说

解释为丧失了自主性的个体对非人化的现实强烈而彻底的反叛。这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只要将《嫉妒》与加缪的《局外人》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作为一个反叛者，加缪在《局外人》中尽管也描述了个人在物化社会中的消极行为与无能为力，表现出生命的无目的，生活的无意义，但是作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某种理想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通过意志和回忆对绝望作出了抚慰。它使作品的表现现实的力度大大削弱。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终于从作品的背后跃向前台，对读者直接发言：

“从法院里出来走上车子的时候，有一刹那的时间，我又呼吸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看见了夏季傍晚的色彩，在行驶中的黑暗的车子里，在我疲倦不堪的心情下，我分辨出这座过去我所喜爱，并在某一个时期我感到非常满意的城市里每一个熟悉的声音。闲散气氛中的卖报声，街头公园里最后几只鸟的叫声，卖点心小贩的吆喝声，电车在高地上转弯时的刺耳声……这一切都是我进狱之前所熟悉的声音，今天又一次听到它……这是我从前最感幸福的时刻……”<sup>②</sup>